

文库 博士

澳大利亚 工党研究

韩隽 著

工党与战后主要政治改革
工党与战后小政策发展
工党与战后联邦政治协调
工党与战后社会协调发展
工党与战后的主要政治改革
工党与战后的小政策发展

新疆大学出版社

序 言

在韩隽博士撰写的《澳大利亚工党研究》一书由新疆大学出版社列入“博士文库”出版之际，作者要我为该书写一篇序言。由于我对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和主要内容还有所了解，在它即将和读者见面时有义务说几句话，便答应了她的要求。

《澳大利亚工党研究》一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内容不仅涉及澳大利亚工党的历史发展和自身建设，而且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该党在澳大利亚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建设、社会福利、政治发展和外交政策诸多领域中的作用。我相信，它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澳大利亚的社会政治发展，而且对于推动我国对国外政党、特别是国外社会党的研究，也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社会政治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实行政党政治。政党在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对于各国的经济与政治，内政与外交，人事任命与政策过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日益迫切，对国外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研究也变得更加重要了。然而，尽管目前我国对国外政党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总体上说，仍然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力度。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对国外政党的研究，大体上带有“从左到右”逐步展开的特点。这里所说的“左”或“右”，当然不是指研究工作中的指导思想，而是指研究对象本身，即按照“政治频谱”

(Political Spectrum)从左到右排列的国外政党自身而言。具体地说，在20世纪的50至60年代，研究的重点对象是处于政治频谱左边的共产党，首先是苏联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其次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从70年代末开始，研究工作逐渐扩展到社会党（含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等）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到80至90年代，先后出版了诸如《社会党国际文件集》和《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一批重要成果。现在，对国外政党的研究可以说已扩展到了包括共产党、社会党、绿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和极右翼政党等政党群体，以及各国、各地区的政党和政党制度等领域了。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从左到右”逐步展开的这一特点，以及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虽同研究者主观认识与研究能力的提高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政治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同国外政党交往的不断发展，既为研究工作提出紧迫的任务，也为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当然，不论从政党群体来说，还是从国家或地区政党来说，我国对国外政党的研究仍然极不平衡。以社会党为例，欧洲尤其是西欧各国的社会党，如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等通常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对象，研究成果自然也比较丰厚；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则相形见绌。像澳大利亚工党，尽管建党时间和执掌全国政权的时间比英国工党还早，一个世纪以来，对澳大利亚的社会政治发展影响重大，但我国对它的研究工作却还十分薄弱，研究成果更如凤毛麟角。从这个角度来说，韩隽博士撰写的这部《澳大利亚工党研究》的出版，对于推动我国对国外社会党、特别是澳大利亚工党的研究是不无裨益的。

本书是作者将近6年的辛勤耕耘的结果。1997年，韩隽从新疆大学政治系取得了硕士学位之后，考进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燕园的三个寒暑，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

夜以继日地读书、翻译和写作。从入学到毕业，整整三年没有回过一次家。她的汗水终于没有白流：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她的拼搏精神在师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0年夏天，韩隽博士完成了学业，回到了新疆大学工作。两年多来，她在完成新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同时，对博士论文进行了修改和充实，这便是《澳大利亚工党研究》的由来。

作为韩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指导教师，我为本书的出版感到欣慰，并向作者表示祝贺；我希望它的出版对于关心社会党研究和澳大利亚社会政治发展的读者有所帮助，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对书中存在的错漏和不足之处提出批评指正。

林勤健

2003年1月12日

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言	林勋健
导言	(1)
第一章 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	(10)
第一节 工党与战前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	(11)
一、工党传统国有化经济纲领的形成	(13)
二、20世纪40年代联邦工党政府国有化经济纲领 的实施及其影响	(18)
第二节 工党与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澳大利亚 经济发展	(25)
一、20世纪50~60年代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及其 隐患	(26)
二、20世纪50~60年代在野工党经济纲领的调整	(29)
三、惠特拉姆工党政府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澳大 利亚经济发展	(32)
第三节 工党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经济 的改革和发展	(39)
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工党经济纲领的 调整及其对工党的影响	(40)
二、20世纪80~90年代中期霍克—基廷工党政府的 经济重建及其影响	(44)
本章小结	(63)

第二章 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社会的协调发展	(67)
第一节 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发展与调整	(67)
一、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初步确立	(69)
二、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发展	(75)
三、工党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调整	(80)
第二节 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社会合作关系的新发展	(87)
一、工党与澳大利亚工资仲裁体系的建立	(88)
二、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工资仲裁制的发展	(92)
三、工党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社会合作关系的新发展	(95)
第三节 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建立与发展	(103)
一、工党移民政策的变化与战后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的废除	(104)
二、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	(114)
本章小结	(120)
第三章 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联邦政治改革	(122)
第一节 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宪政制度改革	(123)
一、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的产生及其基本内容	(123)
二、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的联邦制改革	(125)
三、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的政体改革	(139)
第二节 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政党制度的改革	(152)
一、工党与澳大利亚联邦政党制度的初步形成	(152)

二、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现代两党制的确立与发展	(158)
三、工党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党制度的新变化	(162)
第三节 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选举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171)
一、工党与澳大利亚现代选举制度的确立	(171)
二、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选举制度改革	(173)
第四节 战后工党与澳大利亚共产党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	(182)
一、战前工党与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关系	(183)
二、战后工党与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斗争及其影响	(187)
本章小结	(197)
第四章 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主要政治社团的发展	(200)
第一节 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工会运动的发展变化	(203)
一、战前工党与澳大利亚工会运动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204)
二、战后工党与工会运动特殊关系的变化	(208)
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工党与工会的两难关系及其影响	(213)
第二节 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绿色运动的发展	(220)
一、战后澳大利亚绿色运动的兴起及其影响	(220)
二、20 世纪 80 年代工党与澳大利亚生态力量的合作及其影响	(227)
三、20 世纪 90 年代工党与澳大利亚生态运动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	(235)
本章小结	(240)

第五章 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发展	(242)
第一节 工党与澳大利亚独立外交政策的出现	(243)
一、战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发展及其特点	(243)
二、20世纪40年代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与澳独立 对外政策的产生	(248)
第二节 工党与冷战时期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发展	
一、20世纪50~60年代工党对外政策的基本内容 及其影响	(257)
二、20世纪70年代惠特拉姆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 及其对澳战后对外政策发展的影响	(266)
第三节 工党与冷战后澳大利亚独立外交政策的发展 与调整	(271)
一、20世纪80年代霍克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及其 影响	(271)
二、20世纪90年代工党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及其 影响	(275)
本章小结	(282)
结束语：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澳大利亚工党	(284)
附录	
表1 澳大利亚历届联邦政府总理	(319)
表2 澳大利亚历任反对党领袖名单及其所属政党	
.....	(321)
表3 战后澳大利亚主要政党在各州执政情况	(323)
参考文献	(325)
后记	(334)

导　　言

“政党是代表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通过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¹⁾在现代政治中，虽然许多国家的宪法没有对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任何一种现代政治制度的运作都离不开政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政党不仅可以通过权力和制度，而且还能通过思想意识和各种社会单位，组织和指导社会发展。”⁽²⁾事实上，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都是在形态各异的政党的领导下完成的。因此，研究政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帮助我们从政治的角度更好地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历程及其内在逻辑，从而汲取有益的成份，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澳大利亚是一个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其经济战略重心的转移，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各国，尤其是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以及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发展战略的提出，澳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因此，对澳大利亚的社会政治发展历程以及现状作深入分析和研究，对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要想对澳大利亚的社会政治发展有一个全面、清楚的认识，对澳大利亚工党的研究必不可免。

(1) 黄宗良、林勋健主编：《政治学原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年，第 131 页。

(2) 林尚立著：《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 页。

建立于 19 世纪 80 年代的澳大利亚工党 (Australia Labour Party) 不是澳大利亚联邦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党, 但却是建立最早、目前规模最大的政党。⁽³⁾

回顾澳大利亚建国史, 人们会发现: 工党的建立要早于联邦的建立。19 世纪 80 年代爆发的澳大利亚海员罢工和剪羊毛工人罢工的失败, 是导致各殖民区工党纷纷建立的直接原因。⁽⁴⁾

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 虽然有一小部分工人信仰马克思主义, 但构成澳大利亚工人阶层主体的是深受英国工联主义影响的英格兰和爱尔兰裔的移民。由这些人为主体构成的澳大利亚工会运动并不希望因罢工的失败就采取激烈的方式推翻现在的政府。在澳大利亚, 人们所要求的是逐步增强民众控制权力的能力——建立一种更加公平的代表制, 确立一种没有财产限制的充分自由的成年男子普选制, 召开有时限的议会, 实行议员支薪制等。而在大多数工会领导人看来, 建立自己的政党, 参加普选并将“自己的人”送入议会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最佳途径。⁽⁵⁾

因此, 19 世纪 80 年代, 当直接的劳工运动遭到政府和雇主的坚决镇压后, 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工会运动便纷纷开始建立自己

[3] 目前, 工党是惟一在六个州和两个特区都建立起支部的政党。

[4] 在此之前, 澳大利亚大陆上没有劳工政党, 甚至鲜有来自劳工阶层的代表参加议会选举。各殖民区的工会运动主要是通过交换支持的方法获得议会内某些议员的支持, 但是, 这种类似君子协定的“交换支持”承诺, 在该候选人当选后并不总是能够得以兑现。

[5] 事实上, 在 19 世纪中后期, 澳大利亚特有的殖民发展历程无形中也给了澳工会运动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19 世纪的澳大利亚幅员辽阔、自然环境恶劣、劳工相对较少, 这一切使得新大陆上的阶级关系相对和缓, 等级观念比较淡漠。在这里, 工人们不止一次地发现, 他们完全可以利用参与立法活动来达到与实行直接劳工运动同样的效果, 即相对较高的工资、较好的生活条件、较合理的工作时间等。事实上, 1856 年南澳大利亚殖民区确立了成年男子普选制度, 成为世界上最早确立这一制度的地区之一。到 1896 年, 澳大利亚 6 个殖民区中有 5 个先后实行这一普选制。而英国直到 1918 年才确立这一制度。1856 年维多利亚殖民区还成为世界上最早确立秘密投票制的地区。

的政党。与它在欧洲大陆上的伙伴不同的是，这些政党建立的初衷大部分不是革命而是改良。^[6]

1891年新南威尔士的工会组织建立了“劳工选举同盟”（新南威尔士工党）。同年，南澳大利亚建立了“联合工人党”。1892年维多利亚工会运动建立了“进步劳工政治同盟”，不久改组为“维多利亚统一工党”。在此之后，昆士兰、塔斯马尼亚、西澳大利亚的工会运动也先后建立起了自己的政党。1901年联邦建立前夕，六个殖民区的工党联合建立澳大利亚联邦工党。原各殖民区的工党成为联邦工党的支部。

建立之初，这些党便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很快，工党在每个殖民区的议会中都拥有一席之地。1893年，昆士兰的安德森·道森（Anderson Dawson）组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党政府。1904年J·C·沃森（J. C. Watson）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党全国政府。1910年澳大利亚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工党独立控制的全国政府。在此过程中，工党逐渐形成了一种重实践、轻理论的传统，并带有强烈的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

特殊的建党经历意味着，在澳大利亚，工党与工会运动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政治联盟关系。这使得历任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在工党内部都有着广泛的权力。同时，工人阶级特有的集体主义传统，和工人们对工党议员政治动机的怀疑等，都促使工党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组织管理机制，以确保议会外党组织对工党议会党团拥有绝对领导权。工党要求每一个加入党组织的新成员必须宣

[6] 2001年5月，在一次演讲中，前联邦工党反对党领袖比兹利表示：澳大利亚工党起源于19世纪的劳工运动，但是，工党从一开始所期望的就不是马克思或者列宁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通过投票获得社会公正。这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有时是缓慢而充满挫折的。虽然在1913年，列宁曾经嘲笑澳大利亚工党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政党，是一个阶级调和的政党。但是，工党认为这正是其力量所在，工党致力于为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寻求更好的生活，通过一种民主的途径，通过劝说、讨论与和解。工党认可议会民主（详细内容参见“Centenary caucus meeting”<http://www.alp.org.au>）。

誓遵守党的纲领和决议。由工会和工党基层党组织把持的工党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决策中心。由选举产生的工党决策委员会成为党的核心权力部门。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工党进行组织结构改革前,工党议会党团一直被严格地置于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这样一种特殊的组织结构,使得在工党的议会外党组织与议会内党组织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并一度给工党的政治利益构成了重大威胁。

不过,另一方面,严格的纪律和规范的组织结构,也使得工党能够在大选中和议会中表现出比对手更强的动员能力和战斗力。

当时澳大利亚工会运动中特有的“劳工至上主义”、“伙伴关系”,“排外、狭隘”等特性对早年工党的纲领和政策影响颇大。

在二战前,澳大利亚工党曾经 6 度在联邦执政,除此之外,还多次在各州大选中获胜执政。^[7]在二战后 50 多年中,澳大利亚工党在联邦累计执政 20 年,并多次在各州执政。虽然从时间上看,其执政时间要大大低于两党联盟政府执政时间总和,但是,政党对其所属国家社会政治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是不能仅靠执政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二战后,即便在野期间,工党也一直是联邦议会中的反对党。^[8]而工党战后的每一次执政都是在澳大利亚社会政治发展处于重大转折的关头。因此,工党在讲述自己的历史时曾经骄傲地说:“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工党总是能够挺身而出,担负起领导澳大利亚人民渡过难关的重任”。

虽然这一说法带有政治广告色彩,但是,如果我们把战后工党的执政经历做一个简要的梳理,便会发现上述结论也不无道理。

40 年代,面临战争威胁时,澳大利亚人民挑选了工党的柯廷担任国家总理。在工党政府的领导下,澳大利亚赢得了抗日战争的

[7] 澳大利亚工党在各州的影响力可参见附录表 3。

[8] 详细情况参见附录表 2。

胜利。战后，是奇夫利工党政府组织和领导了战后经济重建工作。这一时期，联邦工党政府大规模地兴建公共设施、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稳妥安置返乡的士兵，并制定了战后最大规模的移民计划，引进大批澳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劳工和技术人员。在工党的努力下，澳大利亚人有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联邦工党政府还提出了一种具有独立自主倾向的外交政策，澳大利亚开始学习对自己周边乃至世界其他角落发生的事情做出独立的判断。这一时期工党政府的工作，为日后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2年由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大获全胜。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良计划的推行，打破了由于保守主义政党联盟的长期执政而带给澳大利亚的“沉沉暮气”。在工党执政期间，虽然政府在经济管理上出现了较大的失误，使经济发展一度受挫。但是，工党政府的社会改良计划的推行，对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在工党执政的三年间，澳大利亚社会有了巨大的变化：城市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改进和发展，大批现代化的城镇出现在澳大利亚。一个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被建立起来，澳大利亚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传统的社会意识和观念则被新的思想所慢慢取代，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澳大利亚国家开始变得开放和宽容”，一种新型的多元文化社会开始得到建立。^[9]

1983年，当霍克领导的工党重返联邦政府时，澳大利亚正面临着战后5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霍克—基廷政府所推行的经济重建不仅使澳大利亚走出了困境，而且使之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在工党政府执政的13年间，政府为澳大利亚创造了200万个就业岗位。这一时期，为了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

[9] Centenary caucus meeting

态迎接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挑战，工党政府改革了货币金融体系，进一步开放市场，其步伐之大令世界瞩目。除此之外，在政府的努力下，一种具有伙伴意识和互惠责任与义务的社会合作关系得到提倡和建立。一度紧张的劳资关系有了较大缓和，澳大利亚第一次迎来了长达 6 年之久的劳资和平时期。

在政府的努力下，土著人的合法权利得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来自亚洲的移民迅速增多，多元文化社会有了进一步的成长。经济的发展、现代化意识的增强、社会的进步，使得 90 年代澳大利亚人的民族自信心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工党政府提出了“融入亚洲”的发展战略，并且宣布政府将致力于在 2001 年在澳大利亚实现共和制。显然，工党期待的是一个更加独立、开放、成熟、更加现代化的澳大利亚，而工党将为这样一个澳大利亚的出现做出自己的努力。

事实上，无论执政还是在野，工党都是联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缺少的活跃因素。如果没有工党的积极参与，战后澳大利亚社会政治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与此同时，不断发展变化的澳大利亚国家与社会也规约和改变着澳大利亚工党。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工党不断地进行着适应性的内部调整。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二战后澳大利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0]

正因为如此，本书选择工党作为了解和研究澳大利亚的一个切入点。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工党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改良主义政党。其理论与实践，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既有相似之处，

[10] 在 2002 年 10 月召开的工党特别会议上，联邦工党领袖西蒙曾经这样描述这一过程：“70 年代惠特拉姆先实现了工党的现代化，然后再率领工党推动澳大利亚社会的现代化。现在，我们要致力于工党的现代化，为了一个现代化的澳大利亚。”

又有自己的特点。对工党的研究，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跟踪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选择工党作为切入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澳大利亚工党是澳大利亚国内最早向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伸出友谊之手的政党。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奇夫利政府便决定和英国工党政府、新西兰工党政府一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只是由于接踵而至的大选，以及工党在大选中的失利，这一计划被搁置下来。1971年7月惠特拉姆作为当时的联邦议会反对党领袖应邀访问中国。1972年12月21日中国与刚上台不久的惠特拉姆工党政府发表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从此，澳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工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也有了迅速发展。工党的领袖如惠特拉姆、霍克、基廷等多次以政府总理或反对党领袖的身份访华。例如，从1971年到1987年，惠特拉姆先后五次访问中国；从1978年到1986年，霍克先后三次访问中国。在此期间，自由党的福雷泽两次出访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在野还是执政，工党一贯坚持支持中国政府在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这将有利于亚太乃至全世界的繁荣与稳定。此外，工党还一贯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张加强澳中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与安全事务上的合作，积极推动澳中友好关系的发展。

目前，在国内，相对于欧洲中左翼政党的研究而言，对澳大利亚工党的研究不是十分充分。国内还没有出版过研究澳大利亚工党的专著。相关的文章也并不多见。这为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在国外，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有关工党各方面的研究专著十分丰富，研究也相当深入。因此，本书材料来源主要以英文为主。笔者尽其所能搜集相关资料，诸如工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纲领性文件、领袖的自传、联邦议会的会议纪录、澳国内有关学者的专著、新

闻评论、国际互联网上公布的文件等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一些材料的作者所持的政治立场、观点不尽相同,因此,不同的材料对同一个问题或同一个历史事件的论述会有一些出入和差异。在引用材料做出判断时,笔者尽量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量多方查对原始资料,以求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刚刚开始研究澳大利亚工党的新手,笔者在一些数据的引用、对历史事件的判断等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疏漏或偏差。在书中也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不当之处,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提出批评,给予指正。

全书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虽然工党政府组织和领导了澳大利亚战后经济重建工作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需要的变化,工党传统的国有化经济纲领已经无法适应战后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无法在经济管理取信于选民,工党在大选中屡屡败北。进入70年代中后期之后,工党全面地调整了自己的经济纲领,并努力树立起在经济管理问题上的良好信誉。这一调整使工党得以重返联邦政府。进入80年代,工党政府的经济改革不仅使澳大利亚经济走出低谷重新步入高速发展之路,而且使得澳大利亚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做出了最初的应对。

第二章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能够高效、稳步进行的先决条件。本章从考察战后的澳大利亚阶级关系、劳资关系、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入手来说明,战后工党的社会政策对战后澳大利亚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以及新型社会合作关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章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联邦政治改革。在这一章,从考察工党在战后澳大利亚宪政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工党与战后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的发展等角度入手,来说明工党对战后澳政治体制的改良使得其在确保稳定运转的同时,又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适时

地进行自我调整与更新,从而为经济的稳步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第四章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主要政治社团的发展。在本章探讨了战后工党与工会运动、生态环保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工党与澳劳工组织、新左翼运动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地了解工党在战后澳大利亚政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第五章是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发展。作为一个执政党,工党的对外政策对澳大利亚国家对外政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二战后,历届工党政府都积极推行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工党认为,澳大利亚可以独立地对国际事务做出判断并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诉求。工党的这一主张与其特有的民族主义传统以及工党自身的日益开放密切相关。毫无疑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推行,有助于澳大利亚国际地位的提高,又会对澳大利亚国内社会政治的发展产生一个良好的促进作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澳大利亚工党”是本书的结束语。在这一部分,笔者从工党和联邦工党政府对经济全球化的应对这个角度入手,来说明工党之所以能够在战后澳大利亚的政治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关键在于工党总是能够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对自己的纲领政策、发展方向、人员构成等方面做出适时的调整与更新。而工党对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发展进程的积极参与,正是促使这一系列改革发生、完成的重要外因。战后,澳大利亚的社会政治现代化与工党自身不断现代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通过对“工党与战后澳大利亚的社会政治发展”这一论题的探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现代国家中,政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政党要想在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始终居于领导地位,或能够长时间地发挥重要作用,必须首先确保自身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不断地调整、更新、完善自我,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固步自封或因循守旧只会扼杀政党的生命力。